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与张静如、姜秀花同志商榷

贺世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逐步深入，许多有新观点新材料的著作与论文相继问世，活跃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空气，这无疑是个大好现象。可是，有些文章在探讨五四运动的领导、性质和意义等问题时，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论断与史实相悖，令人难以接受，很有必要进一步争鸣。例如，张静如与姜秀花在《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文（以下简称“张文”），我们就不敢苟同。因为“张文”否定“开端”说的理由并不充分，很难令人信服。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提法，是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总结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所以能被学术界和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是因为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被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所验证，并不是某位领袖或权威人士强加于学术界的一个主观结论。

“张文对”“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论证，主要阐述了两个论点：第一，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二，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我们认为，这两个论点的理由都不能证明“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命题。下面分别阐述我们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论点，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是历史事实，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新民主主义开端”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并没

有违背历史实际地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的原话是：“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时是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论述十分清楚，不必多加解释，就会一目了然。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说，也不是根据是否无产阶级领导而总结出来的。从宏观的历史时期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领导权是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这个观点在原则上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领导权的体现一定要阶级政党的成立。因为政党的成立固然是表明一个阶级政治上的成熟，但政党的成立又必须经过酝酿和准备阶段。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开端才能有准备，有了准备才能成立，这是很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开端，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之前，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能开端。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开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历史进程的。

张文在论证“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这个论点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五四运动时中国思想界不存在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连大批“朦胧”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陈独秀“不是”，邓中夏“不象”，毛泽东“也算不上”。“因为他们同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仅有李大钊一人，“也只是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当然对五四运动也就没有多大影响了。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分析不符合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情况。

我们认为，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析，不能离开五四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即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那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入中国不久，大部分知识分子还不甚了解，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把俄国革命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分化，从原来向往西方国家民主革命转向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当时流行的社会新思潮中的一种，虽然初步学习和信仰社会主义新思潮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毕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初步受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中出现的这两个方面的新情况，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了一个先进的群体。毛泽东恰如其分地称这个先进的群体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要求。只能是初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把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理解为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或已经著文论述过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理解为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这个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尽管如此，可他们代表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整个知识界的发展方向，并在五四运

动后迅速转化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如果用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数量多少，或有没有著文介绍过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判断是不是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很难说明问题。众所共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先阅读或者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等。早在五四运动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也介绍过马克思学说的内容。但是，他们并不能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尽管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客观上引导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如此说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条件，但关键是有没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我们认为，这样分析问题，不仅适用于五四时期，也适用于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直至现在。

至于具体判断衡量五四时期是否具备了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我们同意彭明同志提出的两个条件。现摘录如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即由民主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过渡。具体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称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我觉得有这样两条就可以了：第一，同情和拥护十月革命；第二，有一种‘朦胧’的共产主义意识，即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这种‘朦胧’可以来自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来自无政府主义或其他什么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

时的青年学生中，这种意识更多的来自无政府主义，他们还不能严格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只要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算作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了。”^①

按照这样的条件来分析，五四时期中国有没有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在这里举几个“张文”提到的人来说明问题。众所公认的李大钊，早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于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篇文章通过《新青年》杂志的传播，影响了中国一代知识青年。至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不少亲历者已写下了回忆。并不象“张文”所说“是想当然的推论，并无材料根据。李大钊是不是直接领导了五四运动，谁也说不清”。

再看李达，五四运动时正在日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他不仅参与了发动中国留日学生对国内五四运动的声援斗争，而且于6月18日、19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6月24日，他又因陈独秀被捕在《觉悟》上发表了《陈独秀与新思潮》，指出“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潮’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立足在二十世纪！”李达的文章正是发表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之中。“张文”认为这些“文章是理论性的，与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结论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4月20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一文，已把十月革命称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他在五四运动中起

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1日亲自上街散发而被捕入狱。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可信的，但说他连一个“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就令人不解了。

说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瞿秋白、王若飞、杨匏安、李汉俊、王尽美，以及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可以说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夕或者在五四运动中，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先后接受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并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当然，五四运动还有大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才能使五四运动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的结论是，五四运动之前和五四运动中，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代表着运动的方向。

“张文”在论证“五四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论点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虽然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并没有起决定作用。因“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变成自为阶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灌述到工人群众中去，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自发的”。我们认为，在五四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起着带头和发动作用，学界罢课行动之后才有工界的罢工斗争。可以这样说，运动初期工人阶级的行动是迟缓和被动的。但是，当工人运动起来之后，五四运动才真正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为了认识工人罢工斗争在五四运动中的决定作用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五四前一年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情况。那次运动开始就有近3000名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发动，北京学生也群起响应，但终究没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行动和支援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次斗争很快就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于6月5日开始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大罢工，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斗争之坚决，是史无前例的。当罢工初始，是与学界、商界采取一致行动，但在斗争中逐渐由自发向自觉转化，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张文”说：“把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说成是‘决定性’的，本身就是一种夸大。”“退一步说，就是工人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不能以此代替领导作用，因为这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也不同意说工人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因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时还没有完成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也没有统一的工人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至于说工人罢工斗争在五四运动的发展中有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不同意“张文”所说“完全可以找到几条材料证明工人参加斗争是自愿的，与资本家的妥协性、帝国主义的干涉做过斗争，但同样可以找到另几条材料证明工人参加斗争是学生动员的，甚至是代替资本家去的，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的观点。我们认为，在五四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即6月5日之后，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罢工斗争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这不仅是找几条材料证明的问题，而是工人罢工斗争在五四运动中的实际作用所决定的。虽然北京学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全国学生起而响应，起到了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但当时的中国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数量有限，最集中的北京有2.5万人，上海是2万人，其他城市则更少。学生的罢课斗争也确实前呼后应，奋力

抗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威胁并不大，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无所顾忌。到了6月初，形成了学生与政府互不退让的相持局面。当运动发展到商人和店员罢市，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对峙的局面。而工人阶级一旦参加了罢工斗争，形势就大为改观，五四运动立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海的工人相当集中，五四时期，产业工人近20万人，交通运输工人10多万，还有20余万手工业工人。从6月5日至11日，工人罢工风潮迅猛发展，从产业工人，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相继奋起站到了运动的前面，工厂停工，轮船停航，火车停开，罢工斗争声势浩大，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城市。这个斗争的声势迫使军阀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对人民作出让步。

对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身临其境的上海学联看得十分清楚，他们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①

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学界商界相比，还表现在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上。工人阶级罢工虽然在学生罢课之后，由学生的影响而发动，但各行各业的工人参加罢工仍然是相当自觉的。当学生还在动员商人罢市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工人们便主动酝酿实行政治罢工支援学生斗争。此时，不仅西方国家的侵略者进行破坏，而且中国的资本家也进行阻挠，甚至青年学生也受资本家的影响劝阻工人罢工。可是工人仍然自动投入了罢工斗争，他们一再声明罢工出于自觉。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

①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3日。

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①工人阶级一旦投入到罢工斗争中去，就表现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性。6月9日，当三罢斗争进入关键时刻，上海总商会竟然发出通告，要求各商店开市。工人们在第二天发出通函严厉指出：“近闻北京派来奸细，运动开市，假令成为事实，置我工界绝大牺牲于不顾，工界同人现已公同决议，即令商界同意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②6月12日，上海2000多工人在四明公所召开工界大会，准备成立全国性的工人团体，“以表坚决救国之热忱，非达到确实之目的不止”^③。这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比之学生、比之商人有更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大罢工，虽然还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工人团体，但这次运动却为以后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准备了条件。

总之，从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来看，是可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开始觉醒了。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说的那样：“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的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认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少有的痛苦，迎接世界革命的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虽然邓中夏在这里不是直接讲的五四运动，但他所指的这个黎明时期的开始，确实是指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我们的结论是：从工人罢工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来看，也说明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张文阐述的第二个论点，是五四运动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这不是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说。

张文认为，五四运动在反帝方面，“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在反封建方面，“提出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内除国贼”，而这一口号又具体落实到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显然它不涉及推翻反动政府的问题”，因此，“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两个时期。其实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无论是反帝斗争还是反封建斗争，都是不彻底的，表现出明显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所以功败垂成。相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表现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么，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开端。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评价五四运动的。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而“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杰出的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我们的理解，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五四运动的“姿态”，是指五四运动发展的趋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趋势。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具备这种发展趋势呢？

①《字林西报》1919年6月11日。

②《时报》1919年6月11日。

③《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

毫无疑问是具备了这种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发展趋势的。正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来解释，才合乎毛泽东所阐述的原意，即五四运动以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由青岛问题引发的，所以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开始时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卖国贼身上，并且对巴黎和会抱过幻想，这是循乎常情的。到了六五运动之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工人阶级斗争的矛头便指向了北京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6月6日，上海求新机器厂工人全体罢工，并公开宣布：“摧斯裕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①工人们还在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上书“毋忘国耻”，“唤醒国民”八个大字，鼓舞斗志。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也提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工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所说的“根本改造”，是针对着“政府”而言，并非仅指惩罚卖国贼。7月1日，上海各团体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拒约签字救亡办法，到会10余万人。当学界商界代表仍在喊“挽救危亡”、“拒签和约”的口号时，中华工业协会的代表就提出：“救国须国民一致反对卖国政府。”工界代表更明确表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为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②

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通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渐清楚。6月8日，中华工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的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吾辈主张工人自动，各行工人组织小团体，然后联合成大工团。第一步举行工人游行示威运动，第二步举行工界大罢工，第三步牺牲吾辈数十万工人的赤血，与野蛮的强权战。”^③这里所说

的“野蛮的强权”，就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中华工党虽然还不是觉悟了工人团体，但当时参加的成员却都是产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这一宣言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呼声。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著文宣称：“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④稍后，李大钊又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明确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⑤

读完“张文”最后部分第五点说明中的一段话，感到这段话似乎是为我们的论点作的结论。照录如下：“五四运动为旧的向新的民主革命的转化提供了如下的条件：其一，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得到锻炼，显示了力量；其二，促进了民主主义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有更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三，使先进分子提高了觉悟，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其四，提高了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北洋军阀政府本质的认识，民众中的先觉者懂得了只有推翻现政权，中国才会有出路。总之，正是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出现开辟了广泛道路。”既然如此，那怎么能说“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呢？

①②《时事新报》1919年6月7日、7月2日。

③《新闻报》1919年6月8日。

④《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⑤《国民杂志》第二卷第1号，1919年11月。